

魔山：那时与现在

崔之元

慎文卿 译 杨涛 校对

编者按：去年一月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以 Rimini Protokoll 为笔名的一群艺术家在达沃斯举办了批判反思“世界经济论坛”的展览，该展览将于本月下旬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继续展出（<http://www.rimini-protokoll.de/website/en/project/weltzustand-davos-staat-4>）。

本期公号发表崔之元应这次展览之邀撰写的英文评论“魔山：那时与现在”的中文翻译（英文曾发本公号第 214 期，链接）。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达沃斯肺结核疗养院为背景，其主题之一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这和今日世界多国的“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的冲突有很大相似性。同时，托马斯·曼笔下的关键人物之一 Leo Naphta 是以两个真实历史人物为部分原型的：极左翼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奇和极右翼的“第三帝国”概念的首倡者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托马斯·曼与卢卡奇的父亲熟悉，卢卡奇在 1919 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失败后逃到维也纳期间与托马斯·曼长谈过；而曼和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所建立的“六月俱乐部”也有接触，这个俱乐部的网络后来对希特勒的上台发挥了重大作用。托马斯·曼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人物塑造成同一个 Leo Naphta，是独具匠心的。常被视为美国极右民粹主义代表的特朗普首席顾问班农也自称“列宁主义者”，他被迫辞职的原因是给极左翼的记者打电话透漏白宫内部政策斗争。在意大利大选中得票第一的“五星运动”党常被视为“中左民粹主义”，其领袖 Luigi Di Maio（前餐馆服务员）说他们党的经济纲领和 Thomas Piketty（“21 世纪资本论”的作者）很接近，但“五星运动”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联合执政。这些当前的重大事件反映了托马斯·曼关于极左和极右可以合流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也反映出传统的左右划分已经不能准确地刻画今日世界。据“纽约客”2019 年 4 月 11 日报道（<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ispatch/steve-bannons-roman-holiday>），特朗普的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最近在罗马建立了一个学院，致力于在欧盟今年 5 月 23 日的欧洲议会大选中推动民粹主义。希望本文有助于推动读者加深对超越传统左右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认识。



According to the invitation, printed in Italian, on the letterhead of an arcane association called Lettera22, the topic of Steve Bannon's European speech would be "*Gli algoritmi dell'Informazione*"—the algorithms of information. Bannon, formerly of

班农在罗马

正文：

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主持人Charlie Rose的访谈中，回忆起他与唐纳德·特朗普在2012年的首次见面¹。班农认为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populist）”，但让班农意外的是，特朗普坚持自己是流行主义者（popularist），而不是民粹主义者。而这似乎表明特朗普不知道民粹主义（populism）观念在美国有着悠久传统，可追溯到1890年代的人民党。然而，特朗普对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不了解并没有阻止他的“民粹主义”候选人形象在2016年成为主要竞选广告之一。他提到他的目标是改变：

“负责经济决策的全球权力结构，其抢夺工人阶级、剥夺我们国家的财富，并将钱放入一小部分大公司和政治实体的口袋”。

在同一个广告里，特朗普挑出了亿万富翁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高盛CEO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以及美国联邦储备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作为“精英”的代表，指责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的生计。凑巧的是，这三个人都是犹太人。²

就任美国总统一年后，特朗普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做了一次演讲，虽然淡化了他的“民粹主义”竞选信息，但依然有着反精英的暗示：

“最为重要的是，感谢所有勤勉工作的男男女女，他们每天尽职尽责，让这个世界变得对每一个人都更好。让我们一起向他们表示我们的爱和感谢，因为是他们让我们的国家真正运转起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一位罕见的左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1995年以来每年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他认为2018年达沃斯会议是最差的一次：

“当今年的演讲结束时，任何关于激励达沃斯CEO们的价值观的幻想都被打碎了。这些CEO们似乎最担忧的风险是民粹主义者对由他们建立并从中极大获利的全球化的强烈反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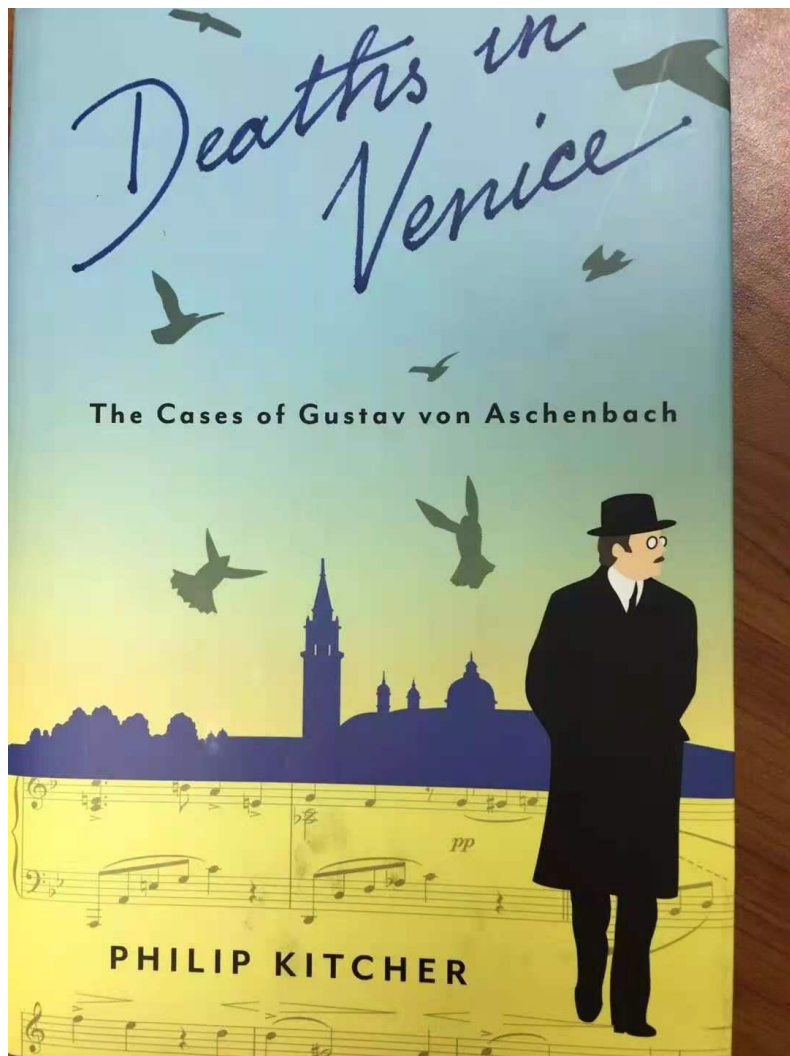
尽管特朗普可能只是嘴上对“勤勉工作的男男女女”说些好听的话，但似乎他的“民粹主义”暗示已使达沃斯“精英们”感到不安。我们该如何理解笼罩在达沃斯山上的这片“民粹主义”乌云呢？

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z9FqepcRUM>

² 'Donald Trump's Argument For America',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7,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video/politics/team-trump-donald-trumps-argument-for-america-campaign-2016/2016/11/06/218f32d4-a443-11e6-ba46-53db57f0e351_video.html?utm_term=.1bbd654b8650

³ Joseph E. Stiglitz, "Post Davos Depression", *Project Syndicate*,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avos-ceos-tax-cuts-trump-by-joseph-e--stiglitz-2018-02>

我认为托马斯·曼（Thomas Mann）1924年的小说《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可给我们提供两个层面的启发：第一，曼在这部小说里面“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阐明了当前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第二，更有趣的是，曼对“莱奥·纳夫塔（Leo Naphta）”这个角色的描述。纳夫塔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耶稣会信徒，他阐明了当前右翼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合流。曾投票给特朗普的部分白人工人阶级支持者说，要是当时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话，也许会把票投给他。



（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杜威讲座教授Philip Kitcher对曼另一小说“威尼斯之死”的研究著作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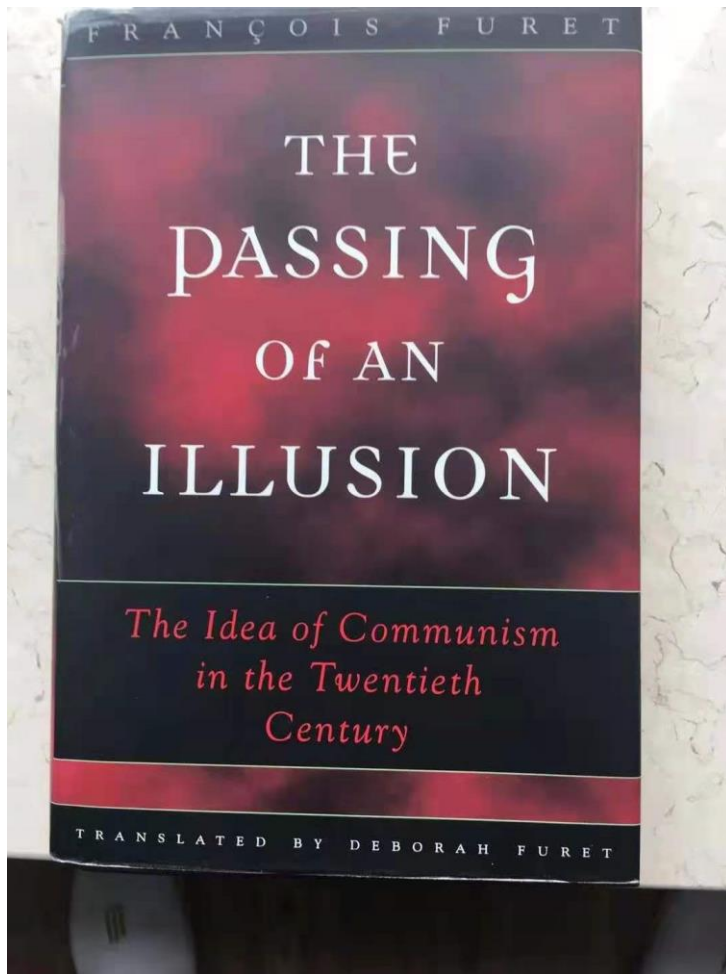
“魔山”讲述了23岁青年汉斯·卡斯托尔普（Hans Castorp）在达沃斯的疗养院Bergh所经历的成长（详细描述主人公成长过程的）故事。1907年，卡斯托尔普来到疗养院探望他的表兄，但由于也被诊断为肺结核，他在疗养院度过7年，直到1914年。在疗养院，两个年长的角色为了争取到卡斯托尔普的心灵与思想，对他的教育展开竞争。其中一人是意大利的人文

主义者卢多维科·塞塔姆布里尼（Ludovico Settembrini），另一人是纳夫塔，此人是耶稣会信徒（以前是犹太教徒）和共产主义者。对于曼来说，塞塔姆布里尼的角色代表的是“文明（Civilization）”，其与生命、启蒙、自由民主、西方、理性主义、平等，以及全球化有关。与此相反，纳夫塔的角色代表“文化（Culture）”，其与死亡、威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浪漫主义、不平等与民族主义有关。有趣的是，曼最初支持的是“文化”，1912年曼的妻子在达沃斯的疗养院待了几个月，他在探望妻子之后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然而，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曼的立场逐渐从“文化”转移到“文明”。这可能可以解释在小说结尾处为什么纳夫塔在与塞塔姆布里尼的决斗中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纳夫塔更具诱惑力，因此更加吸引青年汉斯·卡斯托尔普。

值得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的著作《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中引用较长片段。其中，他非常有力地阐述民族主义在那时与现在的吸引力：

“在二十世纪进程中，民族主义让人类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并造成了那么多灾难，以至于我们倾向于记住的只是它的罪行，而忘记了它的吸引力所在。它的力量——不仅在德国，在欧洲各地，包括巴黎与维也纳也可以见到，来自于它将现代性的承诺与传统的安慰（reassurances）结合起来。当公民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其他国家之上时，他们可以将它转换成权力、繁荣和文化的化身。通过将一切，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服从于国家，他们恢复了感情，其帮助他们忘记作为个体的孤独。对国家的崇拜消灭了民主的公民赤字（civic deficit）。当主要欧洲国家准备通过普选权、社会团结、普遍受教育的机会吸引广泛的普罗大众时，这种崇拜达到了顶峰。尽管将特殊置于普通之上，将祖国置于抽象的权利之上，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民主主义的后裔，在某种程度上其与民主主义是分不开的，既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又是民主主义的否定。它用一种比他们的选举代表更无限强大的凝聚手段，展现了构成欧洲现代社会的个体。”⁴

⁴ Francois Furet, “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43.



(Furet书)

在重要意义上，托马斯·曼的“文化”与“文明”对比预示了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对“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对比。只要“全球化”的存在形式主要是让每个国家的“精英”受益，“经济民族主义”就只是民粹主义者呼声的另一种表达，因为反精英主义定义了民粹主义。这就是我们今天通过阅读“魔山”所能得到的第一个启示。

第二，曼这部小说更为重要的洞悉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右翼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合流。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策划者史蒂夫·班农，由于给著名左翼记者Robert Kuttner打了电话而失去白宫首席战略师这一职位，这看似很难理解。班农对Kuttner说的话发人深省：“很荣幸终于追到你。我看你的文章已经好多年了，我觉得在中国方面，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我们可以说右翼与左翼民粹主义者都有着反精英主义立场，但前者进一步指责精英娇惯（coddling up with）第三类群体，其可能是犹太人、移民、伊斯兰教主义者等。用John Judis的话来说，“左翼民粹主义是二元的，右翼民粹主义是三元的”⁵。但是，我认为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之

⁵ John Judis, “The Populist Explosion”, Columbia Global Report, 2016.

间的关系比二元/三元的区分更复杂。

通过“利奥·纳夫塔”的角色，托马斯·曼提醒我们左翼与右翼的属性是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的。这就是曼在小说中对纳夫塔的描述：

“像许多有天赋的犹太人一样，纳夫塔由本能决定，既是贵族又是革命家。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对参加最自豪的、最美好的、最排外和常见的生活梦寐以求。他（在天主教神学家面前）的第一番表达，实质上是对罗马教会的一种感情宣誓，是一种精神的和贵族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反物质的），是一种高于世俗和与世俗相抵触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革命的）。他所表达敬意是诚恳的和深刻的。因为，正如他自己所阐明的那样，犹太教由于它世俗的和物质的倾向，它的社会主义，它的政治智慧，实际上同天主教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与有着神秘的主观感受和自我牺牲的新教相比。因此，一个犹太人皈依罗马天主教信仰无疑会更少有激烈的精神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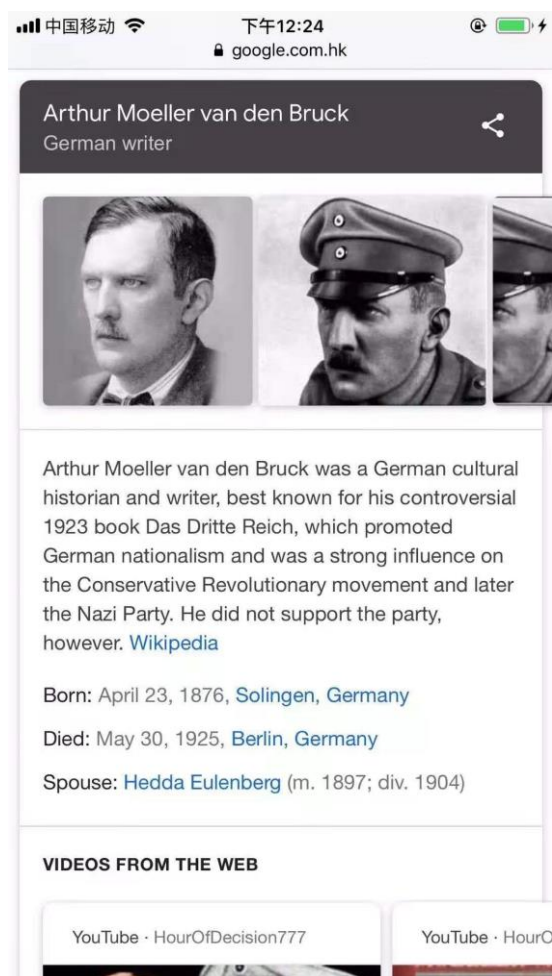
曼在这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犹太教、天主教，以及共产主义能够在纳夫塔同一个人身上共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纳夫塔的角色是以极右翼的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与极左翼的卢卡奇（Georg Lukacs）为部分原型进行塑造而成。曼很了解卢卡奇的父亲，并于1922年在维也纳见过卢卡奇。关于非自愿地成为纳夫塔的部分原型这件事卢卡奇曾开玩笑说过：

“为塑造纳夫塔这个角色而借我的鼻子或嘴，我怎么会以此为由对他记恨在心呢？我欠他的很多呢！这似乎是一个朋友过来问我：‘我忘了带雪茄烟盒，你可以借我一支吗？’这就是我如何把我的特点借给托马斯·曼。”



（卢卡奇照片）

卢卡奇的极左翼观点曾被列宁在1920年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an Infantile Disorder）》中点名批评，这件事非常有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托马斯·曼还与极右翼的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所建立的“六月俱乐部”有接触。当然，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是“第三帝国”概念的首倡者。曼以卢卡奇与Arthur Moeller两个人为纳夫塔的部分原型的决定，精巧地突显了极右翼与极左翼势力联盟给自由民主所带来的危险。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的照片）

托马斯·曼一个世纪以前的警告在今日显得更为紧迫。尽管纳夫塔在与塞塔姆布里尼的决斗中自杀（这与史蒂夫·班农在接受Michael Wolff采访时抨击特朗普的儿子的“政治自杀”（political suicide）没有什么不同。Michael Wolff的著作《火与怒》揭露了白宫内部的混乱程度），但是右翼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合流依然是世界许多地方现存自由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都很厌恶支持有大量追随者的强势领导的体系（institutions）。但是自由民主的朋友们没有时间满足于现行体系。实际上，现在正是对现

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体系进行真正改革与创新的最佳时机。这些改革与创新的目标应包括民粹主义者要求的“理性内核”（rational kernel），以创造更平等的财富分配和更有意义的民主参与。Rimini Protokoll的《Weltzust and Davos》在达沃斯展出，这里也是托马斯·曼的《魔山》的故事的发生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经济论坛的内容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良好机会。尤其是，由于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中抱有雄心大志的参与者对民粹主义的高涨而感到不安和恐惧，Rimini Protokoll的“日常生活的专家”观念对他们应该是一堂具有启发性的课。他们不应该遵照“历史”的错误语言，而是应该倾听31岁Luigi Di Maio的呼声，他之前是一名服务员，现在是刚刚在意大利大选中赢得最多选票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党的领导人。与托马斯·曼的左右合流的主题一致，反对移民乘坐“海上出租车”到达意大利的Luigi Di Maio，主张按照“21世纪资本论”的左翼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建议对“资本主义”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传统的左右划分已经不能准确地刻画今日世界，我们进入了需要世界范围的理论创新的时代。